

社会生态适应模型下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再探究^①

——基于CGSS2021的检验

陆杰华 陈炫齐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1)

[摘要] 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 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仍然是学术界的重要议题。基于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21)的数据, 本研究引入了社会心理学的社会生态适应模型, 旨在以新的视角探究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融入影响机理。研究发现, 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程度主要受到受教育水平、语言能力、住房产权和婚姻状况四个方面的因素影响。这些因素不仅整体性作用于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程度, 还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他们的经济立足、政治参与、人际交往和身份认同水平。通过实证检验社会生态适应模型中的关键因素, 本研究进一步挖掘了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深层次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综上, 本研究以社会生态适应模型为实证研究视角筛选和确定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关键因素, 为下一步有效缓解农民工社会融入困境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 农民工; 社会生态适应模型; 社会融入

[中图分类号] C9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1613(2024)03-0001-13

1 研究背景

流动人口指出于工作、生活等目的离开户籍所在地并异地居住的人员^[1]。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中国国内的流动人口呈现出城乡流动的鲜明特点, 主要体现为农民工的跨地区迁徙。农民工是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主力军, 是户籍仍在农村, 年内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或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 外出农民工则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外从业的农民工^[2]。伴随工业城镇化向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推进, 农民工进城规模逐渐扩大。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指出, 全国外出农民工为17190万人, 比2021年增加18万人, 增长0.1%; 其中跨省流动7061万人, 比上年减少69万人, 下降1.0%; 省内流动10129万人, 比上年增加87万人, 增长0.9%; 由乡入城的流动比率稳中有升^[2]。

人口流动现象在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和人类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得到了广泛关注^[3]。社会科学学界已有研究较为集中地关注流动人口以整体形态呈现出的社会问题^[4], 而心理学和其他行为科学的关注视角则集中于流动人口个体层面的心理现象^[5]。在跨文化心理学领域, 对于流动人

① [基金项目]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研究”(20ZDA32)。

[收稿日期] 2024-03-25

[作者简介] 陆杰华, 男,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学系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社会学; 陈炫齐, 女,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主要研究方向是人口社会学。

口整体和个体的研究得以结合起来,相关研究主要结合了跨文化心理学中的“社会生态适应”概念^[6]和发展和社会心理学中的文化认同概念^[7],综合考量流动人口社会文化层面的问题和个人心理层面的问题。

既往研究认为,中国外出农民工呈现出城乡间往返的显著特点^[8],且呈现出“由乡入城”“由城返乡”的生命轨迹代际传承的特征^[9],其“返乡”行为背后蕴含着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和身份认同问题^[10]。因此,外出农民工的社会融入作为一个流动人口问题,值得社会科学和心理学领域共同关注。

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末在城镇居住的进城农民工为13256万人,进城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和适应度不断增强^[2]。进城农民工中,45.7%认为自己是所居住城市的“本地人”,较2021年提高4.2%^②。从进城农民工对本地生活的适应情况看,85.2%表示对本地生活非常适应和比较适应,较2021年提高2.2%^③。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农民工新增流动比率显著低于新增城市落户比率,仍有较高比例的农民工选择在由乡入城后离城返乡。在农民工规模扩大与流动增强的趋势下,对农民工社会融入程度与影响因素的研究尤为重要。当前,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社会文化与内部心理因素为何?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社会生态适应过程和社会融入程度的差异性如何?相关社会生态适应模型是否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解释中国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在上述研究问题下,本研究尝试使用社会心理学的理论视角筛选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入程度的主要因素,有利于了解新时期中国农民工在城乡间的处境,为进一步有效缓解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提供必要参考。

2 相关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2.1 农民工流动与融入的主要理论视角

由于农民工属于流动人口重要的一个分类,现有农民工流动与融入的相关研究主要采用社会流动的分析框架。社会学领域对于社会流动的研究主要以两种分析框架为主:一是以社会结构为分析框架,并引入社会流动概念,用以考察伴随流动中的社会成员的流动模式、流动动力和规模等;二是以社会关系网络理论为框架,解释流动人口的个体流动过程^[11]。

除了上述两种分析框架之外,有研究通过界定“社会融入”概念构建农民工问题的分析框架,提出了五种融入类型,并在此基础上尝试为农民工社会融入的调查与测量制定一套具有普适性、系统科学的量化指标体系,用以指导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数据收集与数据检验^[12]。对于社会融入的界定,相关研究主要考察从经济整合、文化接纳、行为适应到身份认同的过程^[13],构建农民工进入城市地区后认同与适应的融入过程体系^[14]。也有研究将身份认同界定为农民工适应城市生活的心理基础,强调不同的身份认同对农民工与城市的融合程度与融合方式的决定作用^[15]。以上研究多将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归因于流入地的户籍政策、住房供给条件等社会性因素,将社会融入视为从隔离、选择性融入到融合的递进过程^[8]。

②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③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另一部分研究则以家庭框架考量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提出农民工生活方式与生命轨迹的“代际更替”现象,但暂未使用更具系统性和解释力的理论模型对这一显著现象进行说明与剖析^[9]。后续研究延续这一关注,基于多点追踪调查法收集的经验材料,明确城市地区的农民工具有背离个体化趋势的“家庭化”特点,并关注游离于城乡之间的“半城市化”群体,做出“流动的新传统主义”的结论^[16]。

2.2 基于社会心理学视角的社会融入研究

伴随着社会经济背景的变迁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包含农民工群体在内的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日益得到社会学与心理学等跨学科领域的共同关注。社会学界已有研究更集中地关注社会融入以群体形态呈现出的社会问题,而心理学和其他行为科学领域则将关注视角集中于社会融入过程中个体层面的心理现象。

农民工问题的研究视角逐渐从经济领域扩展至社会心理学领域,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理论被引入研究之中。有研究以“边缘性”概念为农民工的社会认同问题做出定位,并引出入城农民工“半城市化”的构念,指出部分农民工介于回归农村和融入城市之间的不明朗状态,用以分析农民工在城市的融合问题^[17]。也有研究将“权力剥夺”的视角引入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中,关注农民工城市地区“流动但不定居,定居但不融合”的显著现象^[18]。目前,社会学界已将社会心理学领域关于“融入”和“认同”等理论引入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和身份认同的研究领域^[10]。

既往的经典社会生态适应模型大多采用聚类分析策略,进行了面向跨国移民青少年的社会生态适应调研,探寻其社会生态适应态度、文化认同以及心理适应、社会文化适应的状况^[9]。但此类研究仅面向西方国家移民青少年,尚未将研究拓展至非西方国家的移民青少年或西方国家的成年移民。因而,为探寻经典社会生态适应模型和文化适应理论的普适性与有效性,在中国进行本土化的农民工社会生态适应、认同与适应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概而言之,中国农民工的社会适应问题已在社会学学界具有广泛的实证研究。但在此领域,社会心理学视角的研究仍有待探索,西方社会心理学关于迁移流动人口问题的理论模型在中国农民工问题中的应用尚不丰富。引入社会生态适应模型和文化适应理论,有助于与传统的社会学理论结合,为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的研究补充社会心理学理论的支持;同时也有助于将农民工的文化适应和社会生态适应问题从群体层面向个体心理层面拓展,为相关研究的空白提供一定程度的补充。

因此,本研究将社会生态适应模型与文化适应理论作为探究中国农民工社会适应问题的理论支撑具有较高的价值,通过检验“社会生态适应模型”中影响流动个体社会生态适应和文化适应的因素的作用或表征,试图以此挖掘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进一步深入解读中国流动人口中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融入问题。

2.3 社会生态适应模型与研究假设

社会生态适应模型根据个体社会生态适应方式的多样性将社会生态适应策略进行分类,一是对保有流出地原有文化和群体身份的态度;二是对融入流入地社会和社会认同的态度^[20]。据此,社会生态适应策略被分为同化、整合、分离和边缘化。同化策略指迁移流动人口个体放弃保持原有文化认同,但融入并采取流入地社会的文化认同;分离策略指个体保有原有文化认同,而拒绝

融入流入地社会；整合策略指个体既保有原有文化，又选择融入流入地社会；边缘化策略则往往由于社会排斥或歧视而放弃融入流入地社会，又因原有文化丧失等原因而不再保有原有文化。

社会生态适应研究要求对迁移流动人口心理层面和文化层面的社会生态适应现象分别加以概念化和测量。在农民工的融入和认同的测量维度上，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的研究需要，对社会融入指标的操作化界定有较大差异，但总体集中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几个关键领域。具体测量维度有戈登的“结构—文化”二维度融入^[21]、杨格塔斯的“结构—社会文化—政治合法性”三维度融入^[22]和恩泽格尔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接纳”四维度融入^[23]等。国内学界主要沿用恩泽格尔的四维度融入测量路径^[24]，或采用经济融合、文化适应、社会适应、结构融合和身份认同等五个方面的测量指标^[25]。

本研究遵循社会融入感多维测量的考虑、涵化模型的测量要素及数据的可操作性，主要参考和借鉴恩泽格尔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接纳”四维度融入指标，一方面更加强调对两种群体文化接触并社会生态适应前的特质进行考察；另一方面则从个体心理层面强调考察个体心理变化、行为变迁和社会生态适应应激反应，兼顾内部性的心理变化和社会文化方面的文化适应，从而考量适应与社会生态适应结果^[26]，最终将社会融入程度划分为经济立足、政治参与、人际交往和身份认同四个层面。

图1展示了本研究的研究框架以及相应指标的操作化，分别对农民工社会生态适应进行文化或群体层面和个体或心理层面的梳理。

既往理论与实证研究中，社会生态适应各维度指标的影响因素主要涉及受教育水平、健康水平、年龄、性别、户籍类型、工作性质、婚姻状况、语言能力、住房模式等因素^{[4][12][24][27]}。

首先，社会融入的经济水平指标由就业机会、工资水平等具体指标构成，通过受教育水平等人力资本的差异产生分化^[27]，并且受教育水平和语言能力等文化资本也通过影响农民工的文化适应能力作用于社会融入过程。语言能力作为迁移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重要文化资本，对于农民工在流入地的工作类型和收入水平产生影响^[28]。

其次，社会生态适应的公共参与和人际交往指标由邻居交往、居委会参与等指标构成，并受到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态度影响。诸多研究表明，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态度和社会融合程度受到其是否在婚、是否具有配偶的婚姻状况影响^[29]。学界对于农民工的婚姻状况的关注聚焦于婚姻与流动模式、社会融合、城市化发展的相关性研究。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迁移，是中国农民工群体的主要迁移特点之一^[16]。在传统家庭观念的影响下，农民工群体对于“家”的认同主要依托于家人所在地，因此，已婚或与恋人同居的农民工在城市地区具有更强烈的定居意愿。此外，中国农民工群体的返乡或定居城市的意愿和行为呈现出鲜明的年龄阶段性特点。在婚龄单身农民工群体中，男性往往将积累一定财富后返乡建房结婚生子作为在外打工的奋斗目标^[9]；而婚龄女性农民工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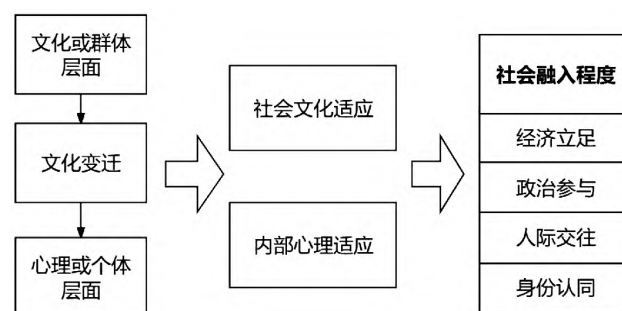


图1 基于社会生态适应模型的操作化框架图

多由于家庭压力和传统观念，被迫或主动返乡结婚^[30]。相反，婚姻状况为在婚或同居的农民工在城市地区定居或留在城市的主观意愿更强，返乡成家的压力也更轻，因此在城市地区呈现出更高的社会融入度。此外，语言能力也对于农民工在流入地的社会交往、文化适应等融入过程具有影响^[31]，并作用于农民工自我认同与底层的主体建构^[32]。

此外，社会生态适应模型认为，身份认同指标主要由收入水平、社会地位感知等具体指标构成，并在实践中可能受到住房模式、消费水平等因素影响。根据现有研究，在城市地区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民工以雇主或单位提供的住房和工友群体的“群租房”为主要住房来源，多位于市郊、城乡结合部的“城中村”，且多为“工棚”等临时建筑，存在居住拥挤、生活设施简陋、卫生条件差、治安混乱等影响居住感受的问题^[33]，而住房问题中住房产权所有对于农民工的社会地位感知、定居意愿和融入感具有较强影响^[28]。

据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 1：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程度受到受教育水平的影响。

研究假设 2：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程度受到婚姻状况的影响。

研究假设 3：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程度受到住房产权的影响。

研究假设 4：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程度受到语言能力的影

3 数据、变量与分析策略

3.1 数据来源

对于农民工社会生态适应策略与文化适应的评估，主要参考社会生态适应模型的分析框架与分析机制，考察农民工在务工城市地区的生活方式、语言使用、文化认同、社交行为、身份认同以及未来生命规划。

本研究数据来自 2021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21）。该调查采用多阶分层抽样的方法，以中国 22 个省、4 个自治区（不含西藏自治区）、4 个直辖市（不含港澳台）共 2801 个区县单位为初级抽样单元（PSU）。数据库统计了其涉及年限内居民的基本信息，与本文研究相关的变量大致包括：性别、年龄、户籍登记地、职业收入、语言使用、教育程度、是否拥有住房、社会态度等。

现有研究与理论中，“户籍类型”往往被视为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中介变量^[17]。笔者根据研究需要，对数据及数据形式进行了清理和调整。样本对象为户口类型为农业户口、居住于城市地区、从事非农工作的人，共 1073 个分析样本。

3.2 变量及其测量

3.2.1 因变量及其测量维度

本研究试图分析农民工社会融入度影响因素的差异性，根据社会生态适应模型的四个维度的指标，将经济立足水平、公共参与水平、人际交往水平和身份认同水平作为因变量，并将四个因变量加总为主要因变量“社会融入度”。由于社会生态适应模型的同化、整合、分离和边缘化四类策略对应着不同程度的社会融入度，故本研究将社会生态适应模型的融入程度差异操作化为农民工社会融入度的差异，将经济立足操作化为收入水平，收入条件处于平均水平及以下为 0，收入条件处于平均水平以上为 1；公共参与操作化为政治参与，未参与居委会投票为 0，参与为 1；人

际交往操作化为与社交活动频率,不频繁为0,频繁为1;身份认同操作化为社会地位的主观感知,中位以下为0,中位及以上为1。“社会融合度”由社会融合操作化的四项具体指标合并而成,赋值0~4。

3.2.2 关键自变量与控制变量

现有研究一般认为,社会融入和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包含人际互动与社会关系等社会资本、教育程度等人力资本,以及性别、年龄、工作时长、老家居住地和语言掌握情况等^{[34][35]}。

在本研究讨论的社会生态适应模型中,对流动人口群体的社会生态适应评估主要涉及以下因素:两个群体在接触前已存在的人格调整与能力禀赋;文化接触后群体双方的态度、行为与社会身份或群体归属认知。具体而言,包含健康状况、沟通能力、自我意识、缓减压力、被接纳感、文化熟练行为等^[36]。在社会生态适应的实际测量与研究预测中,心理适应与社会适应的区分得到证实^[37]。在具体评估因素外,该模型提出区分心理适应和社会文化适应的评估要求,并采用沃德等学者对于心理适应和社会文化适应的区分。

基于社会生态适应模型以及既往研究结果,本研究选取检验的关键自变量为受教育水平(小学以下=0,

表1 农民工社会融入因素的变量与样本分布

变量名称	赋值说明	样本数	百分比	变量名称	赋值说明	样本数	百分比
社会融入度	低=0	277	25.8	语言能力	完全不掌握=1	30	2.8
	较低=1	390	36.3		较不掌握=2	148	13.8
	中等=2	213	19.9		中等掌握=3	520	48.5
	较高=3	39	3.6		较好掌握=4	259	24.1
	高=4	0	0		完全掌握=5	116	10.8
住房产权所有	是=1	548	51.1	年龄段	15-24岁=1	66	6.2
	否=0	525	48.9		25-34岁=2	280	26.1
婚姻状况	在婚或同居=1	844	78.7		35-44岁=3	292	27.2
	不在婚=0	289	21.3		45-54岁=4	260	24.2
受教育水平	未受教育=0	31	2.9		55-64岁=5	132	12.3
	小学学历=6	128	11.9	性别	“男”=1	536	50.0
	初中学历=9	358	33.4		“女”=0	537	50.0
	高中学历=12	228	21.2				
大学本科学历=16	310	28.9					
	研究生及以上学历=19	16	1.5				

为控制其他重要因素的影响,本研究纳入了年龄与性别的控制变量,以此检验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在控制潜在的中介变量之后的净效应。既往研究表明,个体的年龄和性别等因素在社会融入过程中影响农民工的社会交往、经济能力和政治参与等多个社会融入指标以及社会融入的实践与个体感知,从而对社会融入度产生影响^[38]。由于CGSS2021的调查对象为18岁以上成年人,且我国法定劳动人口为16岁以上、男性65岁以下人口、女性60岁以下人口,因此本研究根据研究需要,将样本年龄局限于15至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按照10岁组划分并赋值,具体变量赋值参见表1。

3.3 分析策略

本研究涉及的分析模型为多元线性回归。具体模型如下:

$$Y=a+b_1X_1+b_2X_2+\dots+b_iX_i+\varepsilon$$

其中, Y 表示因变量农民工的经济立足水平、公共参与水平、人际交往水平、身份认同水平和社会融入度, X_1, X_2, \dots, X_i 分别表示模型中的自变量以及其他控制变量(详见实证分析部分), 截距 a 表示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均为 0 时, 因变量 Y 的平均取值; 回归系数 b_i 表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 自变量 X_i 每变化一个单位, 因变量 Y 的平均变化情况。ε 表示随机项或残差。

农民工社会融入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 四维度指标影响

表 2 农民工社会融入度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年龄段	0.045*	0.094***	0.069**	0.035	0.043
性别	0.107*	0.083	0.093*	0.087	0.091
受教育水平		0.030***	0.032***	0.029***	0.024**
婚姻状况			0.207**	0.163**	0.164**
住房产权所有				0.238***	0.245***
语言能力					0.058*
常量	0.822***	0.338**	0.233	0.286*	0.116
调整后 R 方	0.006	0.020	0.028	0.044	0.047
R 方变化量	0.002	0.014	0.008	0.016	0.003
F 值	3.551**	7.013***	7.303***	9.148***	8.123***

注: * 表示 $P < 0.10$, ** 表示 $P < 0.05$, *** 表示 $P < 0.01$ 。

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其中模型 1 是控制变量对农民工社会融入度的回归结果。模型 2、模型 3、模型 4、模型 5 分别增加了一个影响因素进行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表 3 呈现关键自变量对农民工社会生态适应不同维度的差异性影响, 其中模型 a、模型 b、模型 c、模型 d 分别以经济立足水平、政治参与水平、人际交往水平和身份认同水平作为因变量。

4 主要分析结果呈现

4.1 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表 2 的实证研究结果, 农民工社会生态适应整合指标的社会融入度受到受教育水平、婚姻状况、住房产权所有和语言能力的影 响。在表 2 中, 模型 2 的结果显示受教育水平拥有对农民工社会融入感得分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受教育水平每增加一年, 社会融入感得分提高 0.030 分, 相比于模型 1 决定系数 R 提高了 0.014, F 值为 7.013 且统计显著, 并且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结果表明假设 1 得到验证, 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会显著影响其社会融入感。既往研究多从人力资本或个体社会适应能力的角度分析受教育水平与社会融入的相关性^[39], 也有研究从社会排斥的视角进行分析^[40], 均得出教育水平高者迁移与定居城市意愿更强、受教育水平显著影响社会融入的结论^[41]。模型 2 的结果与既往研究结论相符, 进一步论证了受教育水平对农民工社会融入程度的影响。

在社会生态适应机制中, 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心理适应突出个体情绪方面, 关注个体情绪方面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 其中婚姻状况作为个体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影响因素被纳入考察。模型 3 在模型 2 的基础上加入了婚姻状况变量, 发现婚姻状况是否在婚或同居对农民工社会融入感起显著积极影响, 婚姻状况为在婚或同居的农民工比婚姻状况为不在婚的农民工社会融入感得分高 0.207 分, 模型 3 比于模型 2, R 方变化量为 0.008, F 值为 7.303 且统计显著。结果表明, 农民工的婚姻状况会显著影响其社会融入感。模型 3 的结果验证了农民工婚姻状况对社会融入的影响, 回应了既往研究对农民工群体婚姻状况与心理适应和社会适应的关注。婚姻状况作为影响个体心理适应的因素, 对于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程度具有显著影响。这一结果与社会生态适应模型对于家庭形式^[16]、人际交往、个体心理^[10]与社会融入水平的相关性说明匹配, 表明是否在婚或有配

偶对于农民工在流入地的社会交往和个体心理适应有着正向影响^[29],使在婚或有配偶的农民工在社会融入指标上的表现整体高于未婚或无配偶的农民工,回应了本研究对婚姻状况与社会融入程度的假设。

既往研究表明,个体经济地位感知和身份认同与社会融入程度具有相关性,而农民工在流入地的住房模式选择也影响农民工的地位感知和身份认同^[42]。住房产权所有作为农民工住房模式的表征之一,对于测量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程度有着较高的重要性。根据模型4的结果显示,住房产权所有积极显著影响社会融入感,拥有住房产权的农民工比不拥有住房产权的农民工社会融入感得分高0.238分。模型4相比于模型3决定系数R提高了0.016,F值为9.148且统计显著。

模型5的结果显示,语言能力对农民工社会融入感起显著积极影响,农民工的普通话掌握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社会融入感得分高0.058分。模型5比于模型4,R方变化量为0.003,F值为8.123且统计显著。结果表明,农民工的语言能力会显著影响其社会融入感。模型5的结果表明,对于农民工而言,流入城市地区后,普通话掌握能力对工作、生活和社会交往等多方面产生着显著作用。既往研究认为,语言能力是农民工与流入地居民沟通的基础条件,会影响农民工对当地文化习俗的了解程度,从而对农民工对流入地文化的接纳程度产生影响^[43]。此外,社会融入过程中社会支持网络对于文化适应、心理适应和社会适应均具有重要影响^[44],而语言能力影响农民工与当地居民或工友的交往活动,从而影响其社会支持网络的构建。

综上,研究结果验证了本研究对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假设,并回应了既往研究关于社会交往能力和沟通能力对于农民工社会关系建构与社会融入影响的研究结论^[33]。

4.2 社会生态适应四维度指标的影响差异性分析

根据社会生态适应模型,农民工的社会融入过程包含社会文化适应过程和内部心理适应过程,并且由具体的经济立足、政治参与、人际交往和身份认同四维度指标构成。根据实证研究结果,由四维度指标整合而成的社会融入度受到受教育水平、婚姻状况、住房产权和语言能力的显著影响,但这些因素对于不同维度指标的影响机制和影响程度存在一定差异性。

4.2.1 经济立足水平

表3显示,模型a中农民工的经济立足水平受到受教育水平、婚姻状况、住房产权和语言能力的显著影响,其中受教育水平的影响程度最为显著,其次是住房产权所有与语言能力。模型中,农民工以收入水平为主要表征的经济立足水平是社会融入的指标之一,并由此指向融入过程与结果的差异。在影响经济立足水平的因素中,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包括受教育水平与技能培训经历等多个方面^[27]。既往研究一般认为,由于受教育水平和语言能力是农民工在就业市场上综合能力的证明与反映,拥有良好教育的农民工不仅拥有更多的工作机会与择业优势,受教育水平和语言能力也通过薪资水平和购房能力等因素影响

表3 农民工社会生态适应四维度指标影响的组间差异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 a	模型 b	模型 c	模型 d
年龄段	-0.012	0.060***	-0.072***	0.006
性别	0.149***	0.027	0.084***	-0.014
受教育水平	0.035***	0.034***	0.006	0.014***
婚姻状况	0.061*	0.037	-0.104**	0.080*
住房产权所有	0.061**	0.011	0.101***	0.087***
语言能力	0.053**	0.010	0.04**	0.062***
常量	-0.416***	-0.522***	0.524***	0.057
F值	32.176**	26.551***	13.496***	6.660***

注: * 表示 $P < 0.10$, ** 表示 $P < 0.05$, *** 表示 $P < 0.01$ 。

着农民工群体的社会适应和社会参与能力^[1]。

4.2.2 政治参与水平

表 3 中, 模型 b 表明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水平同样受到受教育水平的显著影响, 而婚姻状况、住房产权所有和语言能力的影响并不显著。在社会生态适应模型的分析框架中, 农民工的政治参与主要以居委会和人大代表等投票行为的参与作为表征。既往研究认为, 农民工的政治参与主要受到政治制度安排、政府公信力的影响, 也有研究认为流入地的社会接纳或排斥程度是主要影响因素, 但多数研究均将受教育水平视为农民工或公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影响因素^[45]。在本研究中, 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不仅作为人力资本影响农民工的经济收入, 也通过影响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意识与政治参与能力影响其社会融入指标。

4.2.3 人际交往水平

农民工群体的婚育问题作为传统乡土社会中家庭代际责任的表征^[29], 深刻影响着当前农民工群体在流入地区的生活状态与个人发展选择^[9]。既往研究认为, 乡土文化传统和家庭化使农民工承担巨大的家庭代际责任, 关于婚育的亲情、伦理、习俗传统等因素强烈影响农民工群体的心理与生活方式^[29], 有损单身农民工群体对定居城市的意愿与选择^[16]。此外, 诸多研究表明, 当前中国农民工群体内部的性别比严重失衡, 构成了数量巨大的大龄单身男工群体, 并增加了单身农民工对于婚育的心理压力^[46]; 而单身女工群体则受到城乡二元结构外部化的劳动力再生产负担, 在结婚生子、赡养老人等压力下被迫返乡^[30]。因此, 诸多研究结果表明, 婚姻状况对于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程度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

但是, 社会生态适应模型的分析框架将人际交往作为社会融入的具体指标进行分析, 指出婚姻状况对于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影响具有更为复杂和具体的机制, 并对其在流入地的人际交往产生阻碍作用。表 3 中模型 c 的结果显示, 农民工的人际交往水平主要受到婚姻状况、住房产权所有和语言能力的显著影响, 其中在婚或与配偶同居的婚姻状况对农民工的人际交往水平具有负面影响。

4.2.4 身份认同水平

根据表 3 中模型 d 的结果, 农民工的个体社会地位感知受到受教育水平、住房产权所有和语言能力的显著影响, 且三个因素均具有较高的影响程度。其中, 农民工的住房产权所有通过综合反映农民工的个体经济地位, 对其内部心理的身份认同产生影响^[30]。在社会生态适应模型对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的迁移运用中, 受到拉力的农民工群体的流动原因与流动方向被归因为寻求美好生活的自愿行为, 并被分类为流入地的新永久居民和以外来工人为主要群体的“旅居者”^[47]。在流入地的拉力中, 住房作为农民工在城市地区的居住空间, 其产权所有与否使农民工群体内部划分出“新永久居民”和“旅居者”两类群体。模型 d 表明, 拥有住房产权的农民工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认知, 也对流入地具有更高的身份认同, 更可能将自己视为“新永久居民”, 从而影响着社会融入的程度高低, 体现出社会生态适应模型对于社会融入过程中经济立足和社会认可等因素的考察^[5]。

此外, 社会生态适应分析机制中, 通过对社会生态适应评估所涉及主要文化认同因素进行提取, 将生活满意度、自尊或自我评价、学校或工作环境适应被视为重要的分析要素。根据社会认同理论, 群体认同与自尊水平呈现正相关, 而“感知到的歧视”则显著呈现出与自尊水平的负相关^[48]。这类

歧视行为主要源于流入地社会对非主流文化及非主流文化群体采取的否定态度,从而引发流动人口的社会生态适应压力^[49]。以农民工为例,社会生态适应模型指出地区语言的使用能力对于文化认同和感知到的歧视水平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19],并从而影响其内部心理适应过程的身份认同。

5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分析了社会生态适应模型中社会融入指标整合而成的社会融入度,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农民工社会融入度差异分化的影响因素,并为社会生态适应模型中四种社会融入度不一的社会生态适应策略提供了一定的解释依据。研究发现,对于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整体过程而言,农民工社会融入度受到个体受教育水平、语言能力、住房产权所有及婚姻状况的显著影响。

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依据社会生态适应模型的分析框架对农民工社会融入过程的经济立足、政治参与、人际交往和身份认同四个指标进行了差异分析,发现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四个主要因素并非均一地作用于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程度,而是通过差异性的影响机制,对社会融入的四个维度发挥作用,从而使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程度表现出明显差异性。

首先,社会融入程度的主要影响因素包含受教育水平和语言能力,其中社会生态适应的经济水平、政治参与和身份认同三个具体维度受到显著影响。受教育水平和语言能力通过影响文化适应能力、文化技能习得以及流入地对农民工的接纳或排斥和歧视行为,影响社会融入过程与结果。既往研究认为,人力资本与文化能力对于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融入具有显著影响^[42]。诸多研究表明,在迁移流动与社会融入前期,农民工受教育水平^[48]与语言能力^[33]等文化适应能力通过影响农民工的城乡迁移意愿和自我身份认同。这些因素作用于农民工在城市地区的融入过程,影响农民工接纳和认可流入地的文化所需时间的长短^[12],以及农民工在流入地的工作收入水平、社会参与能力、被当地社区居民接纳程度等^[27],从而使受教育水平不同的农民工表现出社会融入水平的差异性,回应了社会生态适应模型中文化因素对于个体心理适应和社会适应的影响以及对社会融入水平的作用^{[26][50]}。本研究进一步证实,在完成迁移流动后,农民工的文化能力对于社会融入的各方面表现也具有积极影响。

其次,社会融入程度受到婚姻状况在婚或同居与否的积极影响,但在具体的人际交往维度上受负面影响。这一结论首先回应了此前诸多研究的观点,表明婚姻与社会交往、生育等社会生活和社会联系在农民社会融入过程中具有促进作用,并说明婚姻通过影响个体身份建构和社会地位促进或延缓社会融入^[38]。不同于已有研究,本研究通过社会生态适应模型发现,婚姻状况并非对农民工社会生态适应的所有维度都具有积极作用,而是指出了婚姻状况对人际交往存在着负面影响。

再者,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程度的主要影响因素包含住房产权所有,这一因素作为社会经济地位的表征,影响经济立足水平和身份认同的指标。在社会生态适应模型理论框架下,住房产权所有是农民工在流入地住房模式选择和收入水平等多方面的综合表现^[33],常转化为农民工在流入地的居住时长意愿、生存能力与生活质量等拉力或推力作用^[5],影响农民工的个体地位感知、内部分化与身份认同^[43],从而使农民工表现出不同的社会融入程度。在居住成本日益高涨的当下,农

民工群体在城市地区面临着巨大的住房压力^[42]。从租房成本或中国社会普遍的购房压力角度来看,住房产权所有均减轻了农民工群体心理层面的融入压力,也为其定居意愿和社会经济地位等方面的社会融入因素产生了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农民工群体在城市地区的社会融入过程中,其心理适应、文化适应和社会适应程度可以被划分为经济立足水平、政治参与水平、人际交往水平和身份认同水平四个具体指标,并受到以受教育水平和语言能力为代表的文化资本、以婚姻状况为代表的家庭因素和以住房产权所有为代表的社会经济地位所影响,在不同维度呈现出差异化的融入水平,并最终整合为个体之间差异性的社会融入水平。

在中国流动人口以离土入城的农民工为主力军的现实背景下,农民工为城乡互动、城市建设贡献强大驱动力。由于存在大量从户籍政策等社会性因素的视角进行的研究,由跨文化心理学角度出发的研究相对较为欠缺。社会生态适应模型强调流出地与流入地双方文化在流动过程中发生作用的相互性,说明社会生态适应过程的双向性,将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由此前学界关注的“同化”问题转向“社会生态适应”问题。本研究基于社会生态适应模型,侧重结合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社会文化与内部心理因素,从经济立足、政治参与、人际交往和身份认同四个维度考察农民工的社会生态适应过程和社会融入程度的差异性。

本研究的不足主要在于所采用的数据样本量较少,且社会生态适应模型的四维度多元指标与关键自变量的部分作用机制难以进行综合分析,可能对部分结果的显著性有所影响。但本研究尝试迁移运用社会生态适应模型,尝试以社会心理学的视角解读中国流动人口中农民工的社会生态适应问题,并通过 CGSS2021 数据对社会生态适应模型中农民工社会融入度的程度差异作出解释,以期由此进一步修补、完善并提升社会生态适应模型对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的解释力,将对丰富和拓展后续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路径。

[参 考 文 献]

- [1]杨菊华. 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 2015(2):61-79.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2022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R].
- [3] Portes, A. (Ed). 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5.
- [4] 任远, 邬民乐. 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文献述评[J]. 人口研究, 2006(3):87-94.
- [5] Berry, J. W. A psychology of immigratio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001(57): 611-631.
- [6] Berry, J. W. Psychology of acculturation. In J. Berman (Ed.),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0(37):201-234.
- [7] Phinney, J. Ethnic identity in adolescents & adults: A review of research. Psychological Bullen, 1990(108): 499-514.
- [8] 张子珩. 中国流动人口居住问题研究[J]. 人口学刊, 2005(2):16-20.
- [9] 周飞舟. 农民工返乡与“城乡中国”的形成[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1):126-129.
- [10] 崔岩. 流动人口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和身份认同问题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12(5):141-160.
- [11] 翟学伟. 社会流动与关系信任——也论关系强度与农民工的求职策略[J]. 社会学研究, 2003(1):1-11.
- [12] 杨菊华. 从隔离、选择融入到融合: 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理论思考[J]. 人口研究, 2009(1):17-29.

- [13] 张永梅,何晨晓,桂浩然.农民工社会融合:基于地区、民族和历时性的比较[J].南方人口,2019(3):25-33.
- [14] 杨菊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社会融入的指标体系——基于社会融入理论的进一步研究[J].人口与经济,2010(2):64-70.
- [15] 张雪筠.农民工与城市主体社会[M].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天津,2007.
- [16] 王欧.家庭化与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方式转型[J].社会学研究,2022,37(1):68-89.
- [17] 王春光.中国社会政策调整与农民工城市融入[J].探索与争鸣,2011(5):8-14.
- [18] 邓大松,胡宏伟.流动、剥夺、排斥与融合:社会融合与保障权获得[J].中国人口科学,2007(6):14-24.
- [19] Berry, J. W. Stress perspectives on acculturation. In D. L. Sam and J. W. Berry(eds.),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acculturation psych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43-57.
- [20] Berry, J. W. 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cultural pluralism. *Culture Learning*, 1974(2):17-22.
- [21] Gordon Milton M.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 [22] Josine Junger-Tas, Ethnic minorities, social integration and crime. *European Journal on criminal policy and research*,2001(9):5-29.
- [23] Han Entzinger & Renske Biezeveld. *Bench marking in immigrant integration*, 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 2003.
- [24] 梁波,王海英.国外移民社会融入研究综述[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0(2):18-27.
- [25] 周皓.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测量及理论思考[J].人口研究,2012(3):27-37.
- [26] Berry, J. W. & Sam, D. L. Acculturation : When Individuals and Groups of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Meet.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0,5(4):472-81.
- [27] 刘林平,张春泥.农民工工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企业制度还是社会环境?——珠江三角洲农民工工资的决定模型[J].社会学研究,2007(6):114-137.
- [28] 熊波,石人炳.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影响因素——基于武汉市的实证分析[J].南方人口,2007(2):52-57.
- [29] 李磊.新生代农民工跨地区婚姻:法律、民俗与亲情的视角[J].中国青年研究,2012(11):65-69.
- [30] Chuang, J. *Factory Girls After the Factory: Female Return Migrations in Rural China*. *Gender & Society*, 2016,30(3):467-489.
- [31] 马戎.中国人口跨地域流动及其对族际交往的影响[J].中国人口科学,2009(6):2-13.
- [32] 潘泽泉.自我认同与底层社会建构:迈向经验解释的中国农民工[J].社会科学,2010(5):74-79.
- [33] 董昕.中国农民工的住房问题研究[M].经济管理出版社,北京,2013.
- [34] 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纪念版[M].商务印书馆,北京,2017.
- [35] 袁靖华.边缘身份融入:符号与传播:基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调查 *Based on Social Surveys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M].浙江大学出版社,杭州,2015.
- [36] Bennett J M. *Handbook of intercultural training*. 2nd edition: Dan Landis and Rabi Bhagat, editors Thousand Oaks.1997, 21(4):124-147.
- [37] Kennedy, A. *Singaporean sojourners: Meeting the demands of cross- cultural transitions*. Unpublished doctoral thesi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999.
- [38] 任远,乔楠.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过程、测量及影响因素[J].人口研究,2010(2):11-20.
- [39] 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社会学研究,2001(3):63-76.
- [40] 胡杰成.社会排斥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J].兰州学刊,2007(7):87-90.
- [41] Phinney, J. , Madden, T. , & Santos, L. Psychological variables as predictors of perceived ethnic discrimination among minority

- & immigrant adolescents.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998(28): 937–953.
- [42] 龙翠红, 柏艺琳, 刘佩. 新生代农民工住房模式选择及影响机制 [J]. *社会科学*, 2019(11):14–29.
- [43] 肖子华, 徐水源, 刘金伟.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评估——以 50 个主要人口流入地城市为对象 [J]. *人口研究*, 2019(5):96–112.
- [44] 李强.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半融入”与“不融入” [J]. *河北学刊*, 2011(5):106–114.
- [45] 朱煜, 刘强, 刘琴. 当代农民工政治关心度与参与度调查分析 [J]. *求实*, 2012(1):78–83.
- [46] Yong Cai, and Wang Feng. The Social and Soci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China’s One-Child Policy. *Annu. Rev. Social.* 2021(47):587 – 6062.
- [47] Sam, D. L., Berry. J. W.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acculturation psych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181–197.
- [48] Berry, J. W. Immigration, acculturation & adaptation. *Applied Psychology*, 1997(46):5–68.
- [49] 陶树果, 高向东, 余运江. 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乡城迁移意愿和城镇化路径研究——基于 CGSS 2010 年数据的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 [J]. *人口与经济*, 2015(5):40–49.
- [50] 李树苗, 任义科, 靳小怡等. 中国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社会支持网络的分析 [J]. *人口与经济*, 2008(2):1–8.

A Study of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by the Social Ecological Adaptation Model Based on the Data of CGSS2021

LU Jie-hua, CHEN Xuan-qi

(Center for Sociolog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remains a significant topic for academic discussion under the process of rapid urbanization In China.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data of CGSS2021, explores the major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by the social ecological adaptation model of social psychology. The results show that education level, language ability, housing property rights, and marital status are the primary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which exert a comprehensive influence on the migrant workers’ social integration, and also have a variety of impacts on their economic stability, political engagement,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social identity. By empirically examining the key factors in the social ecological adaptation model, the study delves deeply into the key factors and mechanisms affecting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nd provides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effectively mitigating the challenges in the migrant workers social integration in the urban areas they move in.

Keywords: Migrant workers, Social ecological adaptation model, Social integration